

第八章 漫漫长征路

出征之前

长征之前的八个多月，我一直是在红军大学度过的。

在“左”倾冒险主义者还占据着中央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当然不会安排我再去做什么领导工作，有机会为培养红军的军政干部，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我也别无他求，安下心来当教员了。

红军大学设在距离瑞金城十多里的一个叫大树下的地方。山坡上一片茂密的松林。据说原先那一带荒无人烟，学员们自己动手，建起了一排排茅草屋。虽然简陋，比起在露天上课、生活，要好得多了。

学校生活，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从指导思想到教学方法，从课程的设置到教材的编写，很多都是仿效、参考苏联红军学校的一套。当时红大校长是张宗逊，随后由何长工继任。全校分为四个科：高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

上级指挥科、上级参谋科。学员约三、四百人，都是从各部队调来的军政领导干部。高级指挥科主要训练师长、政委和军区司令员、政委，其他科训练的是营、团以上领导干部。每期大约学习四个月，一期结束后，学员分回前方，又调来第二批。主要课程有：马列主义常识、党的历史、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参谋业务，等等。

红大的教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兼职教员，多是中央和总政治部有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如瞿秋白同志讲过中国革命问题，总政组织部长李弼庭讲过中共党史，宣传部长徐梦秋讲过马列主义常识，李德也多次来讲过战术课。另一类是专职教员，有宋时轮、周士第、苏进、冯达飞、何涤宙等。我也属于这一类，主要讲政治工作课，有时也讲战术课。开始我和周士第等同志分配在训练部任专职教员。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政治科科长，既要做行政领导工作，又要继续教课，每天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了。

由于自己身处逆境，对全国，特别是对中央苏区周围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不但非常关心，还特别教感。我已被开除党籍，中央对形势怎样分析，采取什么对策，一般是听不到传达的，有时领导上还有意对我实行“保密”。但由于不少同志对我蒙冤受屈表示同情，特别是对苏区某些报刊宣传中不择手段地丑化、谩骂我，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表示反感，加上我办事、讲课都比较认真，无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不把我当外人看待。这样，我也就能通

过各种渠道，知道不少情况。

比如，就在我受审查和服刑期间，也就是一九三三年的十一月下旬，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爆发了轰动全国的“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卖国投降和排除异己的政策，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蒋介石慌忙抽调大量兵力，进攻第十九路军。这本来是我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但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不去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而是继续叫喊什么“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揭露”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所谓“欺骗性”，让第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在蒋介石军队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完全失败。同时也使得我军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招致最后不得不被迫完全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严重恶果。对于这件事，我刚到红大时，也曾隐隐约约地听人议论过。后来，周士第向我讲了他的亲身见闻，我才了解到这次事变的详细情况。

周士第是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过我党的一位老战士。北伐军从广东发前，我们就相识。在北伐战争中，他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铁甲车队队长。南昌起义时，他任过师长。起义失败后，他同党脱离了组织关系。在“福建事变”中，他是第十九路军补充团的团长。失败后，他的部队被打散了。他独自一个跑来苏区投奔红军，并把随身携带的一千元交给了党。他被分配来红大工作后，党籍

“一时还没有得到恢复，直到后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组织根据他的表现，才又重新接收他入党。由于我俩都是教员，过去又认识，便经常在一起交谈。当他把“福建事变”的详情告知我以后，我俩都为这一事变遭受惨重失败深深感到惋惜。当时我党领导人对待这一事变的“左”得出奇的言行，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王明错误路线的认识，为这条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深感痛心。

春天过去，天气一天天热起来，苏区周围的斗争形势也一天比一天紧张。当时我们对前线战斗失利的详情虽然不甚了解，但传言很多，私下议论的也很多。今天有人传说我军已被迫撤出了广昌、建宁等地，明天又有人传说敌人发动了全面进攻，我军“六路分兵”，节节败退。后来，瑞金附近的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相继失守的消息也传来了。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我军将采取什么对策扭转这种局势呢？谁也说不清楚。大家越议论，感到形势越严重，心情也就越沉重。

终于，上面来了通知：准备大转移。转移到哪里去？不知道。转移出去干什么？也不知遭。一个劲地强调要保密，保密，结果是一切都使人摸不着头脑。紧接着，又来了通知：红军大学改编成上干队（上级干部队），隶属军委干部团领导。我被任命为上干队队长。这一任命，出乎我的意料：我这样一个刚被释放的“罪犯”，怎么一跃又当上队长了呢？但是，我还是感到高兴的。敌人的反革命“围

剿”打不破，根据地保不住，只有转移出去才有活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地”一类大胡话，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已经碰得粉碎。现在“转移”虽然晚了一点，但能转移出去，对于扭转危局总是件好事。不久，何长工等学校领导人被调走了。时间紧迫，许多事情不容我多想。执行命令是不能也不应该讲价钱的。于是，我就正式挑起上干队队长这副担子。

当时，红大高级科、参谋科的学员已经毕业，各自回部队去了。剩下两个科：指挥科、政治科，加上当时一部分县级地方干部要随部队转移，又增添了一个地方工作科，总数不到两百人（在以后的长征途中，上干队这个单位人数很不固定。上面陆续分配来一些干部，有时主力战斗部队或地方工作需要，又调走一些干部。多的时候，全队达两百余人，少的时候也有一百多人），就编成上干队了。初期指挥科科长是周士第，政治科科长是余泽鸿，地方工作科科长是冯达飞。

余泽鸿原先在中央机关做青年工作，也受过王明路线的打击迫害。他为人忠厚，处处小心谨慎。冯达飞也是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战士，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到广西工作，参加过百色起义。以后曾任过红七军第二纵队司令、红八军代理军长。他也是因为王明路线迫害被撤职、开除党籍，才来到红军大学的。后来抗战期间在“皖南事变”中不幸

牺牲。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按照通知，我率领上干队离开大树下，准时到达干部团的集合地点——九堡，向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报到。当时干部团新编成的一、二、三营和特科营，都是由苏区原有几个学校的干部学员组成的，不同的是这四个营的学员都是年轻的连排干部，配有较好的武器装备；而上干队的学员则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武器很少，每个班不过两、三支枪。

这天黄昏时分，干部团所属单位集合在九堡村外，随着陈赓团长一声令下，队伍辞别了瑞金的父老兄弟姐妹，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斜阳的余辉照射在山坡上、小河边，山显得格外青，水显得格外秀。队伍在行进，但是谁也没有吭声，都在默默地想着心事，只是不时回过头来想多看上几眼。我的心情和许多同志一样，一则以喜，喜的是转移出去，有希望摆脱掉敌人；一则以忧，忧的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到这块战斗、生活了多年的红色根据地，红军离开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不知又要遭受到多么惨重的磨难和损失！部队越走离瑞金越远，完全笼罩在一片迷蒙的月色中了。

从瑞金到遵义

瑞金到遵义，行程四千余里，历时两个多月。这段路

程，特别是在进入贵州之前，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境最被动，损失最严重，大家的心情也最焦急的一段路程，

出发时，王明路线的领导人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的搬家方式，左右两翼，由一、三军团担任前锋，八、九军团负责掩护，五军团在后压阵，中间是庞大的中央军委纵队，携带着各种笨重的“坛坛罐罐”，在狭窄的小道上，前呼后拥，磕磕碰碰，互相拥挤，缓慢地行进着。

干部团直属军委纵队，是军委纵队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担负着直接保卫军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光荣任务。行军时一般都走在纵队的最后面，上干队又常常是走在全团的末尾。敌人前堵后追，机构这么庞大臃肿，行动这么缓慢拖沓，看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心焦如焚。原先以为转移可以调动敌人，乘机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现在却被敌人紧紧追赶着，是在拚命逃跑，处处挨打，处处被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感到困惑、不安，又无处打听，只是跟着纵队一个劲地往前走，不停地走！

当时，上干队只调给一匹牲口，主要用来为病号和一些年纪较大的教员驮运行李。队部除我这个队长以外，有一个卫生员，负责给大家治疗各种小的伤痛。还有一个挑夫，是个哑巴，瑞金附近人，原先就是红大的伙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跟随部队长征。我这个队长，既没有通信员，又没有牲口。好在当时我才三十出头，身体也还健

壮，行军时，一个小背包，一袋干粮，一只水壶，往肩上一背，就大步走在队伍的前头了。

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开始一段时间，部队大都是夜行昼宿，只是在通过森林地区和那些极难行走的小路时，才在白天行军。一到驻地，教员和学员们休息了，我往往还要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社会情况，要到各科，以至各班看一看是否都住下了，检查一下岗哨警戒派好没有，有时还要到团部去参加一些短会，领受某项任务。

一路上，谁也说不清翻越过多少座山，淌过了多少条河。攀登时最艰苦、因而留下印象也最深刻的是，翻越一座叫老山界的高峰。那天已经是下午了，开始大家听说只要走三十里路就可以越过山顶，并没怎么把它放在心上。谁知越走山越陡，越走路也越窄。到后来竟象在爬梯干。这时已经快到半夜，许多牲口都拥挤在陡壁跟前。天上虽有星先，许多同志手里还举着火把，但路毕竟太难走了，一不小心，人马都可能滚下山去。上级只好下令：就地宿营，明天拂晓再走。这样陡的山坡，在一条宽不过两尺的小道上，躺下来睡觉是太难了，但又没有别的法子可想。有的同志把油布和毯子往身上一裹，横着心躺了下来；有的找到一块坡度稍缓的地方，背靠背地坐下打起盹来。由于实在太疲倦，大家竟酣然入睡了。直到第二天黎明时，炊事员已把饭做好，大家吃了一点后，又互相拉着推着，艰难地爬过这段陡岩石梯，登上了山顶。

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我们上干队的同志，虽然没有同前来围追堵截的敌人面对面地交过手、打过仗，但一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也是不少的。除了要防止敌机的轰炸扫射，防止小股敌人的偷袭以外，还要同各地的恶霸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和特务分子的破坏袭扰作斗争。在途径广西境内的时候，敌人就使出了很毒辣的一手：他们不但事先在我们经过的地方，把粮食和民房烧掉，增加红军吃住的困难，而且派遣了不少特务和坏分子，打扮成普通群众，混进红军的驻地，等到夜深人静后，就在村里村外放起火来。当地的民房一般都是竹木结构，鳞次栉比连成一片，火势非常迅猛，很难扑灭。许多民房都被烧燬。然后，特务们又到处造谣，说红军杀人放火，把罪名加在红军头上。我们上干队的驻地也曾遇到过几次，晚上经常要起来救火。有段时间，学员们不但要背着背包、枪支行军，还要携带着救火的工具，以免宿营发生火灾时忙乱中找不到工具灭火。开始大家很纳闷：为什么半夜会起火呢？后来大家提高了警惕，派出暗哨进行监视，发现起火，就迅速灭火、搜查，终于当场抓获了几个放火的家伙。经过盘问，才知道是敌人在有意捣鬼。

从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蒋介石便在红军前进方向上，设置了一遭又一道封锁线。对于敌人的围追堵截，王明路线领导人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只知道命令部队死打硬拚。这样，就迫使一、三、五、八、九军团等红军主力部队，

同二、三十个师的敌人，进行着紧张、激烈的战斗。特别是在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指战员们浴血苦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当时，我和上干队的同志，对于主力部队如何苦战的详情虽然无从得知，但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是知道的。有些同志开始偷偷议论：“老是这样被动挨打，怎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呢？”“看来不换领导人，是扭转不了被动局面的！”对我来说，感受就更加深切。从一九三〇年到达中央苏区以后，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我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参加者。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都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虽然毛泽东同志被排挤离开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由于王明路线还没有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还在起作用，粉碎敌人这次“围剿”，也只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唯有在这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王明路线领导人推行着一整套错误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听任李德进行瞎指挥，尽管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历时一年，最后还是不得不被迫完全放弃中央根据地。现在，在长征途中，部队又受到如此惨重损失，这怎能不叫人心痛，不令人气愤呢！在这次反“围剿”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成了王明路线领导人转嫁罪责的牺牲品。现在该是他们认识错误的时候了！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肯定能战胜错误

路线，我从一开始就满怀信心，但也知道，道路是不平坦的，错误路线不到碰得头破血流，是不会回头的。由于自己当时的处境不好乱发议论，所以我总是在心里暗暗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刚接到要“转移”的通知时，我看到了这种希望；现在，我预感到这一天的到来，为期已经不远了。唯一感到不安的是，取得这一胜利，竟然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而且不知道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蒋介石已察觉我军的意图是要与二、六军团会合，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大口袋等我们去钻。当时为李德作翻译的伍修权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通：“而对这一情况，李德竟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多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而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中央迫于形势，只得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李德的这种顽固态度，我当时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又开始在起作用了。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其基本精神也知道一些。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我精神为之一振，心想：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红军这下有救了，错误路线的末日看来真要到了。我当时的喜悦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只觉得行军走路，步子也轻快多了。

大约就在到达黎平前后，上级任命余泽鸿为上干队政治委员，苏进接替他任政治科科长。苏进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原先在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当副团长，参加“宁都暴动”过来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红军的师长。以后也因犯“错误”受过王明路线的迫害。余泽鸿任政委，分担了我一部分领导责任。需要向全队布置的事情，我们总是事先碰头商量一下。这样，工作也就做得更加周到一些。

一九三五年元旦，我们到达了乌江南岸的猴场附近。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强占乌江渡口后，军委命令于部团特科营的工兵连迅速架设浮桥。在这样一条水深浪急的大河上架桥，是一项既危险又需要较高技术的艰巨任务。上干队的教员何涤宙被调去进行技术指导。何涤宙在国民党军队里曾任过工兵团团长，到红大任工兵教员。他在架桥等土木作业方面，在当时称得上是个专家。以后过金沙江、大渡河时，先头部队都曾把他请去，研究能否架桥。长征以后，他入了党，但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说要去大城市看病，到武汉以后不辞而别，离开了革命队伍。架桥需要大批物资、器材。于是，我就带领上干队的其他学员，同干部团一、二、三营的同志一道，连夜到各处去搜集木材、竹子、门板、洋油筒、棕绳等等，并一批批搬运到江边。工兵连的同志昼夜奋战，很快把一座浮桥架了起来，中央军委纵队和各军团的后续部队，都从桥上浩浩荡荡地渡过了天险乌江。

几天以后，我们便随中央军委纵队进驻了遵义城。为保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顺利召开，各主力部队分别扼守着遵义周围的交通要道和关卡隘口。我们和干部团其他各营留在城区担任警戒任务。上干队一边休整，一边派出学员到人民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并动员青年参军。经过各单位动员，红军很快就增加了几千人。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我向全队学员简要地总结了离开瑞金两个多月的行军情况。值得庆幸的是，除了少数学员由于主力战斗部队需要，陆续被调走以外，全队没有减少一人。这固然同没有与敌人打仗有关，但是，主要原因还在干全队干部和学员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艰苦奋斗精神。在从大树下出发时，有的领导人对周士第、宋对轮、苏进、冯达飞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曾脱离过党或被开除了党籍、犯有“错误”、“罪行”的干部，是很不放心的。为了防止我们逃跑或干出什么坏事，他们竟布置了一些学员，暗中监视我们的行动。现在全队连一个掉队的都没有，这就雄辩地说明，我们上干队的同志，无论是学员，还是教员，都是值得信任的，是忠实于革命、经得起艰苦条件考验的。

娄山关阻敌

遵义会议刚开完，还没有来得及传这，红军便离开遵

义继续北上。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预定的渡江地点是在重庆上游的宜宾到泸州一线。到达土城附近时，干部团协同三军团、九军团，同蒋介石派来堵截的川军郭勋祺师，打了一场恶仗。

干部团参战的主力是几个步兵营和特种营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我们上干队的学员武器少，加上上级为了保存中、高级干部，不轻易把他们当普通战斗员使用，只是让他们担任一些次要的任务。记得那天从拂晓到黄昏，我们荫蔽在半山腰上，用火火力支援主力部队向敌人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战斗开始很顺利，干部团那批基层干部学员打得勇猛顽强。敌人眼看坚持不住了，突然有几个旅增援上来，把我干部团的火力压了下来。我参战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军委于是下令退出战斗，第一次渡过赤水，向古蔺开进，随后又改道到威信（扎西）、镇雄一带休整。

离开古蔺时，余泽鸿被调离了上干队，留在川黔滇边境地区做地方工作，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他从上干队带走一些干部和部分枪支。他们的工作开展得怎样，不得而知，只是后来才听说，他在斗争中牺牲了。上干队抵达威信时，上级又派莫文骅来担任政委。在这之前，莫文骅在八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

红军在二渡赤水后，一、三军团迅速东进，再次占领了桐梓城和娄山关。敌军纷纷溃逃，一、三军团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击战。参加追击的还有干部团的一、二、

三营和特科营。随后，中央军委纵队也向遵义方向开进，唯有上干队被留在桐梓县城。这是长征以来，上干队第一次离开干部团单独执行任务。这时已是一九三五年的二月底了。我们留在桐梓的任务是担任警戒，等九军团来换防以后，即向遵义归队。前头部队留下了一个警备连归我指挥。我们迅速布置好岗哨，在桐梓城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带着电台和警卫连进了城。他的几个主力战斗团还没有来到。我向罗炳辉报告了桐梓周围的情况，他听完以后说，你们走吧，这里由我们来守卫。这样，我和莫文骅便率领上干队奔向娄山关。

桐梓离娄山关三十多里，由于前头部队已经击溃了敌人，一路上没遇上什么险情。没料到，在快接近娄山关时，我们的后面，即桐梓方向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警惕起来，回头一看，罗炳辉仍然只带着电台和一个连，气喘吁吁地赶来，大队敌人在他们后面紧紧追赶。罗炳辉身体较胖，又穿一双布鞋，走起路来比较吃力。敌人一边口出污言秽语，大声喊叫着要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我指挥上干队的学员迅速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把罗炳辉和他带领的人员接了过来。

事后才知道，原来罗炳辉领导的几个主力团队已经绕过娄山关向遵义方向开进了。他到达桐梓不久，又接到通知，要他也撤出桐梓，赶到遵义。在接近娄山关的路上，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从旁边插了过来，咬住他们紧追不

放。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上干队总共只有一百四、五十人，几十条枪。离开桐梓时，那个警备连又因事耽搁没有赶上来。情况万分危急，我只得把有枪的同志组织起来，并把罗炳辉带的那个连要了过来，在第一线迅速展开，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继续阻击来势汹汹的敌人。没有枪的同志也都找好了石头、棍棒，拉开架势，准备敌人一旦冲过来时，同敌人进行搏斗。双方乒乒乓乓地对打了一阵。我们的枪虽少，但许多同志都经过多次战斗锻炼，枪法很准，打死打伤了不少敌人。我们且战且退，终于把敌人阻止在娄山关脚下。在夜色的掩护下，敌人胡乱地放了一阵枪，停止了追击。

这股放人的出现，事先谁也没有料到。敌情既然有了变化，我们是否还按照原先上级的交代，越过娄山关向遵义归队？当我向罗炳辉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最好还是一起走吧。”娄山关是从川南通向遵义的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娄山关若是让敌人占领了，就要严重威胁已经到达遵义的军委首长、领导机关和数万大军，我把这个意见说了，罗炳辉也认为是个问题，但又觉得上干队兵力单薄，担心我们寡不敌众。我们上干队也有个别同志感到自己人少枪少，难以担负起这样繁重的守关任务。敌人已经到了山下，附近又没有别的兄弟部队，情况紧急，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了。我对罗炳辉说：“这样吧，把你的那个连留给我，

我们一定把娄山关守住，你放心先走吧！”于是，罗炳辉便只带着电台和少数随从人员，越过娄山关奔遵义方向走了。

我们迅速占领了娄山关的主要山头。透过迷蒙的夜色，但见关口周围群峰陡峭，到处是奇岩怪石，草深林密，关下是蜿蜒曲折的川黔公路。居高临下守住关口，就掐断了这贯通南北的唯一通道，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看到这样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大家满怀胜利信心，积极做好各项战斗准备。一路上，我们收容了先头部队一些掉队的战士。他们大部有枪，有两个战士还扛着挺机枪，我们就动员他们留下来一起参加战斗。想继续赶队的，就让他们把枪留给我们。这样一来，战斗力又有所增加，击退敌人进攻的信心就更足了。

就这样，我们扼守在娄山关左右的山上。炊事员埋锅做饭，大家吃饱了，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警惕地守卫着。敌人从正面是难以攻上来的，我们主要担心敌人从两侧迂回上来。但部队就那么多，不能再分做使用。当时我们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被敌人把我们同主力部队隔开，我们只好在黔北一带打游击了。

敌人发现我们已经凭险面守，加上在夜间，一时又摸不清我们的虚实，在山下打了一阵枪，却不敢冒险过关。我们沉着应战，拿定主意：你不到跟前，我不开火。持续了一阵，最后终于听不到枪声了。周围万籁俱寂，只有冷飕飕的寒风在刮着。快到半夜了，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敌

人已经走远，再来进攻的可能性不大了。当我们正准备往山下撤的时候，罗炳辉派骑兵通信员送信来了。信上说，我军在遵义附近打了大胜仗，并嘱咐我们在娄山关坚守到天明，由五军团派部队来换防。大家听说打了大胜仗，精神一振，顿时睡意全消。第二天拂晓，五军团的一个营准时来换防，我们交接后即向遵义前进。

娄山关到遵义九十里。傍晚，我们便赶到了遵义城。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接见了我们。一见面，他就关切地问：“上干队的同志都到了吗？住下没有？有没有伤亡？”我回答说，都住下了，没有伤亡。他听了很高兴，赞扬我们在娄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随后他对我讲了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说会议开得很好，批判了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岗位上。他还告诉我：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取消了对你的处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他说话时态度非常诚恳，使我听了很受感动。最后，他还给上干队布置了一项战斗任务：立即做好准备，并带上工兵，首先把敌人占领的仁怀县城拿下来，随即到茅台，在赤水河上把浮桥架起来。事后才知道，执行这项任务，是为红军三渡赤水提前做好准备。

当我听到周恩来同志讲遵义会议精神的时候，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王明“左”倾路线受到了批判，毛主席的

正确路线取得了胜利，我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成为我党历史上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次会议，还纠正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的冤案，摘掉了我头上那顶“罪犯”的帽子。我的党籍虽然在过金沙江以后，通过组织手续才得到恢复。但是，压在我心上的那块沉重的石头被搬掉了，我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深深地感谢党呢！从此以后，我的精神更加振奋，在漫漫长征路上，步子也迈得更大、更坚定了。

紧接着，上干队的同志也都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内，听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正式传达。大家的心情都很兴奋，一致挽护结束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莫文骅带领上干队和一个工兵连，还有一个步兵连，悄悄地离开遵义，直奔仁怀。遵义到仁怀，约八、九十里，出发前得知，我军的通信部门从窃听敌人的电话中获得情报：守卫仁怀的敌军只有一个连，而且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携带攻城的梯子和一些必需的架桥器材，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高山深谷间穿行。走了一段，突然下起倾盆大雨，虽然披着油布，大家的衣服还是湿透了。夜很黑，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又不能点火把，大家只得摸索着前进。不少同志摔倒了，磕破了腿，扭伤了脚，周士第脚上扎进一根很粗的尖刺，滴

着血，为了不影响赶路，他硬是咬牙忍痛，一颠一拐地前进，到达目的地后，才把刺挑出来，包扎了一下。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跋涉，终于在拂晓时到达了仁怀。我带领尖刀班跑步前进，后续部队紧紧跟上。接近城边时，大家选择有利地形，向城内猛烈射击。敌人遭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纷纷逃跑出城，窜进丛林中逃命去了。这样，没费多大力气，我们就占领了仁怀。

茅台距仁怀约三十里。我们留下步兵连守卫仁怀县城，带领工兵连迅速赶到了茅台。在上千队的掩护下，工兵连迅速把浮桥架了起来。直到红军大队人马三渡赤水以后，我们才回到了干部团的战斗序列。

茅台镇很小，茅台酒却驰名中外。我们在茅台驻扎了三天，我和一些同志去参观了一家酒厂。有很大的酒池，还有一排排的酒桶。我们品尝了这种名酒，芬香甘甜，沁人心肺，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有些同志还买了些用水壶装着，留着在路上擦脚解乏。有的同志打趣说，要不是长征来到达里，这辈子哪能喝上茅台酒呢！如果单凭这点，还得好好“谢谢”蒋介石呢！的确，我们一路上吃尽千言万苦，但也品尝过一些稀奇和有名的东西。路过湘南、广西，我们吃过猫肉，有的同志还吃过猴子肉。以后路过云南时，还吃过有名的宣威火腿。

三渡赤水后，向古蔺方向走了不远，部队又突然掉头向东，于三月中旬四渡赤水，随后又迅速南下，渡过乌江，

到贵阳附近突然转向西南，大踏步地向云南境内前进，把尾追的敌人甩得远远的。

四渡赤水之战，毛泽东同志指挥红军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灵活地调动敌人，实行机动作战，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领导才能。这同红军在通过敌人第一、二、三、四道封锁线时，李德等人只知通令部队死打硬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部队虽然多走了一些路，但是取得了主动，还消灭了不少敌人，而红军却损失不多。我和许多同志都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庆贺红军有了可以充分信赖的领导人。

在这期间，莫文骅又被调往干部团团部任政治处主任。接替他任上干队第三任政委的是周桓。他原先也在八军团工作，辽宁人，在上干队一直工作到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

“红军不是石达开！”

四月下旬的云南，天气已经相当热了。我们只穿一件单军衣行军，还走得大汗淋漓。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了一枪，立即转向西北，直奔金沙江畔。

在这期间，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刘伯坚同志被敌人杀害了。这消息是张闻天同志从收音机里听到，告诉过去同他在上海共过事、现在随上干队一起长征的冯雪

峰的。中央红军离开瑞金时，伯坚等同志被王明路线领导人乘机甩掉，留在苏区。三月上旬的一天，他在于都附近随赣南省党政军机关突围时，不幸负伤被俘。在敌人面前，他坚强不屈。四月二十一日，敌人将他杀害在大余县城郊的金莲山。上干队有不少同志在伯坚领导下工作过，对他的为人十分敬佩。前面已经提到，我同他在苏联同过学，到苏区后又共过事，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听到他遇害的消息，大家都悲痛万分。在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同时，对王明路线也满怀义愤。据苏进后来说，到延安后，有一次他去拜见毛主席提起刘伯坚时，主席感慨地说：“离开苏区时，象瞿秋白、刘伯坚，我的爱弟毛泽覃，都该带出来的。闹宗派嘛！送给敌人杀掉，太可惜了！”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干部团接到抢占金沙江渡口的任务。这时，我们距离皎平渡还有二百八十余里。陈赓团长决定，以三营为前卫营，九连为前卫连，立即出发，我们上干队和其他各营随后跟进。

在这以前，我已经有了一匹马。但我始终没有骑过，面是用它来给大家驮行李。我虽然疲劳一点，同志们却减轻了一些负担。

部队一天走一百多里，赶往金沙江边。金沙江是长江的主要水源，在宜宾和岷江会合后，以下才称长江。这条江是从云南进入四川境内必须越过的一道天然屏障。

这天，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离金沙江只

有四十里的陡坡上。远远望去，江水泛着银光，在高山峻岭间蜿蜒穿行。我们一路下坡，虽是夜间，大家走得还是特别快。走着走着，前面传来了“三营已经完全控制渡口”的胜利消息。接着江水奔流的声音也听得见了。大家抖擞精神，一口气跑到了江边。

原来前卫连来到渡口时，正巧敌人有两条木船过江来侦察。这个连巧妙地俘获了这两条船和船夫。接着就渡过江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敌人厘金局的三、四十名保安队员和当天刚到达江边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控制了渡口。

我们上干队过江后，同干部团其他营一起，就在河边沙滩上露营。睡不多久，全团又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出发，赶到通安镇，去消灭昼夜兼程赶来增援的川军刘元堂部约一个团的敌人。我们在晨曦中走不多远，前面就传来了枪声。一问，才知是先头部队抢占通往通安镇的山顶隘口，正在同敌人进行激战。我们赶到时，隘口已经被拿下了。

中午时分，部队继续往通安镇方向前进。陈赓团长在山坡上指挥这场战斗。担任主攻的仍然是几个步兵营和重机枪连。在距离通安镇几里的地方，我拿起望远镜一看，我军已经占领了有利阵地，疲惫不堪的敌人正在溃逃。我们一气猛追了十多里路，终于把敌人彻底打垮了，俘敌二百多人。上干队的学员也抓了几十个俘虏，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

这一胜利，有效地巩固了绞车渡渡口，保证了中央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的大队人马，都从这里渡过金沙江，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敌人甩掉了。军委通报嘉奖了干部团。

我们在通安镇休息了两天，这是南渡乌江以来仅有的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息。第三天，便向会理前进。会理城里驻扎着川军刘元堂一个师的兵力。军委命令干部团配合三军团攻城。我们上干队的学员也参加了围城。城墙很高，敌人使用了很毒的一手：白天把全城的男女老少驱赶到城墙上，排在第一线，这样，红军就不好开枪；晚上，他们把老百姓的棉被、衣服，浇上油，在城墙上烧得火光冲天，以阻止红军夜间攻城。为了防止红军靠近城墙，敌人还把城墙周围的建筑烧得精光。红军左攻右攻都攻不进去。于是在城墙根下挖掘地道，用棺材装上炸药进行爆破。又因炸药威力不大，没有奏效。为了不耽误行军和减少伤亡，军委下令停止攻城。部队在城外前后住了六天，便继续北上，向大渡河进发。

过了冕宁，便进入彝族区。由于先头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彝族人民的信任，我们在过彝族区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为了表示友好，学员们大都准备了一条毛巾或是几块饼干，作为礼物，送给跑到路边来欢迎的彝族兄弟。礼物虽薄，彝族人民拿到后，都兴高采烈，雀跃而去。

上干队的学员一边行军，一边还抓紧时间坚持学习。

学习的方式倒也简单。大家围在一起，教员讲个什么问题，就算是上课。讲课的内容一般都是联系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讨论的方式就更灵活。有时几个人凑在一起，每人说上三言两语，有时一边走路，一边围绕个什么问题，大家发表意见。大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既交流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又活跃了行军气氛，驱散了疲劳。过金沙江以后，由于敌情不象前一段那么紧张、频繁，这样的学习、讨论也就多起来了。

还在过金沙江以前，有个同志在路上偶然得到上海出版的一本杂志，上面有一篇评论红军长征的文章，说什么“红军的道路就是石达开的道路”。连续几天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上，也叫嚷“毛泽东要成为石达开了”。

红军果真会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么？如果不会，理由又何在呢？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上干队的教员，因势利导，先给大家讲了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故事，随后便组织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边行军边讨论。

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一八五六年和洪秀全分裂以后，率队从南京出走，转战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一八六三年三月被清军逼到这一带，在安顺场被清军联合彝民消灭，石达开也被捕遇害。民间还传说，当年石达开来到安顺场，本来已经渡过一万多人，后因王妃生王子，要大大庆祝，又把已渡河的兵力渡回来。突然河水陡涨，对岸又被清军抢占，进退维谷，终于全军

覆没。

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共同的结论是：红军不是石达开，石达开的悲剧决不可能在红军身上重演。大家列举的理由，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条：一、红军有用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同石达开实行个人领导的农民军根本不同；二、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这同石达开的不联系群众、不依靠群众的农民军也不同；三、红军有严明的群众纪律和正确的民族政策，石达开在这方面也根本不能和红军相比。这在我们顺利通过彝民区时已得到了证明；四、红军指战员有着异乎寻常的勇猛顽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石达开的农民军却相差很远；五、红军的指挥员是一些具有大公无私精神，又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战争的军事家，石达开的思想和才干，根本无法相比。

道理上是弄通了，信心也增强了，但是，红军的环境毕竟还很险恶：后有金沙江，前有大渡河，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左右堵截。大渡河的所有渡口都有国民党的重兵把守。红军果真能顺利渡过大渡河么？

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终于打响了。这项重任首先落到了一军团一师一团的肩上。他们挑选十七名勇士，乘着唯一的一条木船，在我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冒着弹雨，冲向对岸，占领滩头阵地以后，又缴获到两条船。渡口虽然到手了，但要依靠这三条船，把几万红军渡过河去，可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红军渡过金沙江时，依靠六条较大的船还用了九天九夜才过完，而且九军团还是后来从另一个渡口过的江呢！再说，这时一股敌人又已渡过金沙江尾追上来。幸好这时，毛泽东同志及时来到了大渡河边。当他得知这一困难情况后，当机立断，立即决定除我们干部团随一师继续在安顺场过河以外，其余部队，以一军团二师四团为前锋，均溯河而上，从泸定桥过河。

干部团渡河时，我们上干队被安排在全团的最末尾。在我们前而渡河的，是团供给处的一艘载着供给物品和牲口的船。河水汹涌澎湃，河而又宽，这艘船驶到河中间时，不知是撞上了礁石，还是遇上大旋涡，船身剧烈地摇动起来，牲口受惊，乱蹦乱跳，船翻了，船上人员和物资、牲口，全部坠入水中，除两个水性好的船夫没有丧命以外，都被激流冲走，其中有我们上干队政治科派去押船的同志。轮到我们渡河时，政治科党支部书记卢仁灿带领的那条船，在快要靠岸时，也遇到了一次险情，被激流冲下几十米。有的学员正准备跳水，幸亏船夫眼急手快，抓住岸边的一块大石头，这才把船稳住，化险为夷。

渡河后，我们在安顺霸住了两天，即随一军团的一师，成为右路，与作为左路的其他所有部队互相呼应，夹河而上。几天后，左路部队全部越过了泸定桥。大渡河终于被征服，蒋介石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也终于彻底破灭。这样，学员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所得出的“红军不

是石达开”的结论，就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了。

随上干队一起长征的李一氓同志写过一篇《大渡河怀古》的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上干队全体同志在过大渡河前后的万千思绪。写到石达开的悲剧时，他有这样的诗句：“岂有渡来重渡去，翼王遗恨入西川”，“检点太平天国事，惊涛幽咽太伤心”。写到红军胜利渡过大渡河时，他兴奋地写道：“十七人飞十七浆，一船烽火浪滔滔，输他大渡称天堑，又见红军过铁桥”。

左右两路军的会合点是在泸定桥南边的龙八埠。我们到达时，大部分队伍已经继续往前走了，只有三军团的一部还驻扎在街上。从龙八埠继续走是化林坪。这以后，才算完全脱离大渡河，再也见不到这条河了。一路上，我们观察了大渡河的水势，到处都是“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真个没有一处可以架设浮桥。假如没有泸定这座铁索桥，数万红军还真不知道怎样才能顺利越过这条近代史上有名的大河呢！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泸定桥在清康熙时即已建成，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为何想不到从泸定桥过河呢？从这个问题谈起，许多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断然决定红军夹河而上、抢夺泸定桥的英明决策，更加打心眼里表示钦佩。这一事实更加充分表明：红军的确不是石达开！

雪山劲松

在化林坪，我们没有停留，继续越天全、芦山、宝兴，向千里雪山进军。

在天全、芦山的路上，我们遇到两次险情。一次是离开化林坪后不久，突然窜来两架敌机，在军委警卫团和干部团上空盘旋扫射。我们很快荫蔽起来。这时正巧毛泽东同志从后面赶来。大家都在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从容不迫，抬头望了望敌机，才带着警卫员往路旁的小竹林里荫蔽起来。敌机疯狂扫射了一阵，打死打伤了我们几个战士。

另一次是快到雅安的一个小村里。这时，一、三军团的干部都已经走远了，只有干部团随军委总部在这里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拂晓前，不知从哪里插过来一股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从山上冲了下来。眼看总部有被包围的危险，陈赓团长急忙指挥干部团往上冲。我带着上干队也投入了战斗。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把敌人击退，保证了军委首长和总部的安全。

我们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夹金山，位于宝兴的西北，海拔四千多米。山峰高耸入云，白雪皑皑，象一个高大无比的冰雪巨人横躺在我们的征途上。

这次，干部团被安排走在中夹军委纵队的前头。当我们前进到距离夹金山麓还有几十里的地方时，突然下起了

倾盆大雨，整个上干队都挤在一座破庙里宿营。庙破得实在厉害，到处漏雨，我们只得头戴斗笠，背靠背坐在背包上过了一夜。

六月十二日，各路人马都来到离夹金山不远的大碛碛村集合。接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一条小路，向山麓挺进。

在这之前，对于这次翻越雪山要注意的事项，上级已经讲过多次了。要求各单位都要做到“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行的抬着走”，“不掉一个人，不失一匹马”。在到达山麓时，前面的部队在慢慢地往上移动，我和周桓商量后，抓紧时间，针对上干队的情况，再一次进行动员，把大家的劲头鼓得更足了。

一到山麓，气温便骤然下降，脚下的土也冻得梆硬。越往上走，越是寒冷。尽管出发前听当地群众说过，要多穿衣服，要吃些白酒、生姜、辣椒等能发热御寒的食物，但时逢六月，大家都只穿一件单衣，嘴唇都冻得黑紫，上下牙床直打架，发热御寒的食物一时也找不到，只得凭着顽强意志来与严寒搏斗。我和大家一样，手里拄着一根棍子，沿着一条冰雪铺成的小路，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小路两旁，一边是陡立险峻的雪壁，一边是不知有多深多厚的雪岩。如果不小心滑了下去，就会被积雪埋葬掉。我们互相鼓励着，搀扶着，把所有能御寒的都披在身上，拼命爬上了山腰。这时我举目四望，山坡上是一片很大的原

始森林，青松翠柏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树木，银装素裹，傲然挺立在风雪中；抬头朝山顶望去，又是一派风光，泛着银光的冰雪，刺得大家眼都睁不开来。快接近山腰时，突然下起了一阵冰雹，核桃大的冰渣，砸得头上、身上生痛。大家戴上斗笠，抵挡冰雹的袭击，继续往上爬。这时身上简直是冰凉透骨了。想走快点吧，山上空气稀薄，呼吸更加困难，两条腿酸得直打颤。大家咬紧牙关，一步一喘，一步一停，顽强地坚持着往上爬。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山顶是一块不大的平地，有两、三个牺牲的同志躺在雪地上。显然，他们是前面队伍中在爬山时倒下的。我们默默地走过去，就开始下山。

在这次同大自然展开的搏斗中，上千队的同志个个都表现得很出色，真正做到没一人掉队。特别值得提的是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一氓、成仿吾、冯雪峰等六位同志。

长征开始后，中央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知名人士，都分散到各单位，便于在行军中对他们进行照应。徐特立等六位同志便是在长征途中陆续被分配来到上千队的。他们到上千队后的职务都叫教员。那时徐老已年近花甲，不但在上千队，在整个红军长征队伍中，也是年岁最高的。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教育家。早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毛泽东、李维汉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他四十二岁时还满怀豪情，奔赴法国勤工俭学。

五十一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去苏联留学。他到中央苏区后，一直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副部长。由于部长瞿秋白长期留在上海，苏区的教育工作，实际上是由他负责。董必武那时也已年近半白。他是出席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长征前，在中央苏区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这年五十二岁，长征前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其他三人，虽然年龄都不很大，但都是有点名气的人物。李一氓长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长征前任国家保卫局的部长。成仿吾是位有名的文学家，同郭沫若、郁达夫一起，被称为《创造社》的“三杰”，译著颇多。后来到了鄂豫皖苏区，任过省委宣传部长，长征前到了中央苏区。冯雪峰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在上海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等职务，长征前在瑞金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在行军途中，这些同志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处处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年纪大不畏苦，职位高不自矜。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严守纪律。每到宿营地，都主动打水、做饭，衣服破了自己补，草鞋坏了自己编。没有粮食吃，带头啃草根树皮；没有地方歇宿，同学们一道在野外露营。其中徐特立同志给我和学员们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五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

徐老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长者。在宿营地，甚至行

军休息时，经常有学员拥在他周围，要他讲故事。他从不推辞，常常讲得舌焦口干。讲得最多的是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和苏联留学时耳闻目睹的事。异国的风土人情，学员们感到非常新鲜，听得津津有味。他也讲早年在湖南任教的事，寓教育于故事之中，使学员们很受启发。他一路行军，还一路坚持学习。他特别重视搜集学习资料，一张旧报纸上有篇什么文章，他都要剪下来保存着。为了存放资料，他亲手缝制了许多布口袋，把它们左一个右一个绑在身上，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有的学员一再劝他：“徐老，路这么难走，还背着这些破烂干啥？”有的甚至偷偷地给他扔掉一些，以减轻他的行军负担。他听到和发现后，常常发脾气：“平常不注意搜集学习资料，要用的时候，到哪里去找？！”上级为了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匹马，还有一个小马夫。但他几乎从来不骑马，让马帮助学员们驮运行李。小马夫是个孩子，与其让他照顾徐老，不如说是徐老在照顾他。在路上，小马夫牵着马经常掉在后面，走一程，徐老就得站在路边等一阵。到了宿营地，徐老常常亲自喂马，晚上还要起来给小马夫赶蚊子、盖被子，怕他着凉生病。看徐老走得实在累了，学员们常常催他：“徐老，上马吧！”他总是摇头说：“不骑，不骑！”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骑，或者催得急了，他也会冲你发脾气说：“天气这么热，你没看到马驮那么多东西？我要再骑上去，它不就更累了吗？！”这次过夹金山，开始大家很担心他，能不能爬过山去。他就是

不服老，同学员们一样，拄着棍子，顽强地一步一步往上爬。路滑，实在走不动的时候，他就用手紧紧抓住马尾巴，硬是坚持着不掉队。

对这些老同志，大家都很尊敬，经常主动关心照顾。每到宿营地，搞到什么好吃的东西，总要多分给他们一些。行军途中，遇上敌机来盘旋扫射，大家都首先帮助他们荫蔽好。在急行军赶赴金沙江的那天夜里，仅有的几盏马灯，大家都让给他们照明。这次爬雪山，大家首先关心的也是他们。有的把自己的衣物让给他们御寒，有的替他们赶着马，搀扶着他们前进。

我不是诗人，但是，每当我想起当年过夹金山的情景时，心中诗意总是油然而生。我想：如果把上干队的学员和广大红军战士，比作雪山坡上那一片迎风斗雪的青松的话，那么象徐老、董老、谢老这样的老前辈，就称得上是雪山的不老松了。

下山时，自然不象上山那么吃力了。队伍活跃起来，步子越走越快。不久，前面传下话来：山下驻有四方面军的同志，先头部队已同他们胜利会师了。听到这一喜讯，大家兴奋得心花怒放，简直是在奔跑着，很快到了山下。当天晚上，我们上干队的同志也参加了总政治部在达维村统一组织的庆祝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晚会。大家尽情欢乐，半年多连续行军的疲劳仿佛都被驱散了。

这以后，部队经懋功、两河口、卓克基、打鼓、沙窝，

直到毛尔盖。在长达两千余里、历时一个月的征途中，我们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等三、四座大雪山。这些雪山的高度和艰险程度，同夹金山相比，也差不了多少。但由于大家爬一次就增加一次经验，事先该做些什么准备，雪地里怎样走才显得轻松些，何时最容易出现险情，大家心中都有数了。每爬一次，虽然仍很艰苦，但远不如过夹金山那样险恶可怕了。相反，有时一路行军，一路还欣赏雪景。最使我难忘的是，在爬最后那座，也就是打鼓村至沙窝中间的那座大雪山时，我们还别开生面地大吃了一次“冰淇淋”。这事还是从我一句话引起的。在雪山顶上，我们眺望四周，但见远远近近的峰峦，都被雪被覆盖着，在阳光照射下，反射着万道银光，那景色真是美极了！大家忘记了爬山的疲劳，尽情地欣赏起来。我脑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白雪要是拌上白糖，准好吃，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吃冰淇淋吧！”大家一听，齐声叫好。在场的有当时干部团的领导和上干队的教员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郭化若、陈明、何涤宙、冯雪峰、李一氓、周士第、罗贵波等十多个人。大家解下漱口杯，各自从雪堆下层挖出一缸子最洁白的雪。随后，就有人叫喊：“伙计们，谁带着糖精，拿出来‘共产’吧！”于是，毕士梯、郭化若都掏出一个装着糖精的小瓶子，我也把包着糖精的一个小纸包打开了。大家嬉笑着，都争着倒点糖精拌在雪里，吃了起来。边吃边赞美着，这个说：“我这杯冰淇淋，比上海南京

路冠生园的还美!”那个说:“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呢!”后来周士第把雪山顶上的这个小镜头,写成了一篇短文,被收进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中。

在从打鼓到毛尔盖的途中,我接到通知:军委已正式决定,调我到三军团去任参谋长。在这前后,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红大合编,组成了新的红军大学。上干队的同志多数被调出来,分配到各个主力战斗部队去了,少数人留在红大。

在近十个月的长征途中,我和上干队的同志一起行军,一起吃,一起睡,共同经历过异乎寻常的艰难困苦,也一起分享过胜利的喜悦,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现在一旦要离开,大家都有些依恋不舍。到这毛尔盖以后,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辞别了上干队的同志们,到三军团报到了。

草地风云

长征初期,三军团的参谋长是邓萍同志。红军二进遵义时,邓萍不幸中弹牺牲。随后军委派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调总指挥部任参谋长。我到达三军团时,他已经离开了。

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

军团的创始人。我和他相识，最早是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后来我调到红五军团工作，水口战役以后，一、三、五军团就在一起配合行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在闽赣军区和七军团工作，又多次与三军团一起配合作战，彼此更加了解。彭德怀同志是一个有着强烈爱憎和鲜明个性的领导人。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诚恳，胸怀坦荡。他为人刚正不阿，大公无私，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五次反“围剿”时，三、七军团在浒湾配合作战，失利后，中央军委派彭德怀去追查失利的责任。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为我说了公道话，使我亲身体会到彭德怀同志的高风亮节。至于建国以后，他在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为民请愿，蒙冤受屈，义无反顾，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凛然正气，更是有口皆碑。彭德怀同志素以严格治军著称。作战中他身先士卒，部队管理中他严于律己。带兵打仗他是一员智勇双全的“虎将”，管理教育他是一位铁而无私的“严师”。三军团在他和滕代远领导下，是当时红军中很有战斗力的一支主力部队。他时部属的过失，从不袒护，批评起来“火力”很猛，毫不留情而。一次，还是在我刚到三军团不久，记不清是为什么事了，彭德怀批评杨勇，大发脾气，样子简直怕人。我当时在场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便出来作了些调解工作，把杨勇支使走了。事后我才知道，在他批评人时，是不喜欢别人干预的。可能是由于我刚到

三军团，破例给我留了点面子。他批评人虽然很生硬厉害，但由子他一片赤诚之心，由于他不计前嫌，以及平时对干部战士的关怀爱护，被批评的同志事后往往可以从中领略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对有缺点错误的人恨铁不成钢的苦心，从而深深反悔自己，从心眼里感激他。有时批评有出入，他事后了解情况后，就主动找被批评的同志做诚恳的自我批评。所以三军团的干部上下之间非常团结。大家对彭德怀同志十分尊敬、亲热，这种情况直到建国后他任国防部长时还一直保留下来。

同我先后调到三军团的还有李富春同志。他接替杨尚昆同志任三军团政委。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北伐战争中，富春同志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的个人关系也不错。现在，又能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当然是高兴的。

三军团当时下属四个团，即十、十一、十二、十三团。十团团长黄桢（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政委杨勇。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十二团团长谢嵩。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军团司令部除我以外，还有副参谋长伍修权，在我到职不久，他就调到十团任参谋长去了。当时任作战科长的是李天佑，侦察科长是黄克诚，教育科长是孙毅，还有通信科、管理科等，科长的名字记不得了。

我调三军团不久，部队编成左右两路军，开始准备过草地。在准备了必要的粮秣和其他物资，认真进行了思想

动员后，右路军于八月下旬向草地前进。行军序列是：一军团在前，中间是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和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数都和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三军团走在最后。

出发时，周恩来、王稼祥都病在三军团。尤其是恩来同志，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是要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路上行军，也是不行的。怎么办？彭德怀、李富春和我都焦急万分，在一起商量办法。彭德怀苦苦思索了一阵，毅然决然地吐出一个字：“抬！”是啊，只有抬。本来，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抬担架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长征以来，缺粮少盐，风餐露宿，人人身体都很衰弱，要抬又谈何容易。彭德怀对我说，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最后，我们把迫击炮连的同志抽出来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炮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病中的中央领导同志，向草地进发。

过草地的艰苦情景，许多老同志都作过真切动人的描述。整个草地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泽国，没有树木，没有石头，天空不见飞鸟，地上见不到昆虫走兽，更谈不上有什么房舍人烟。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黑色污水。气候奇冷，天气一日多变。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浓雾迷漫，天昏地暗，时

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我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地理和气象条件下，踩着软沓沓的草丛，一步一摇，艰难地前进着。虽然是走在平地上，却比爬山还累得多。稍一不慎，踩进泥潭，那就很难拔出脚来，有的同志甚至被泥潭吞没，献出了宝贵生命。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出发时，大家带的青稞面、炒黑豆，经过雨淋水浇，成了面团，邦硬变味，非常难吃，有的粮食袋掉进有毒的污泥水里，吃不得了。彭德怀同志和大家一样，吃野菜、草根，把胃吃坏了，经常痛得头上冒汗。出草地的前一两天，实在没有东西可吃了，许多同志眼看要被饥饿折磨死去。这时，他忍痛下令把包括自己的那头骡子在内的几头牲口，枪杀了。这才挽救了一些同志的生命。那时，我的身体虽然还较健壮，但也因此得了胃病，经常疼痛，直到后来到了陕北，经过七、八年的治疗、调养，才慢慢好起来。

六百里草地，一般都走了七天时间。同先头部队相比，我们经班佑、到达巴面的时间，晚了一、两天。由于我们走在最后，除了自己行军外，还要负责收容前面掉队的同志，掩埋烈士的尸体。我们出发一、两天后，曾接到一军团的一份电报。除介绍了他们过草地的经验，提醒我们应注意的事项以外，还要求我们派一支部队携带工具，沿途负责掩埋他们没有来得及埋掉的烈士的尸体。我们报告了一起行军的恩来同志，并按照一军团领导同志的意见，加

强了这项工作。据当时统计，三军团收容前面部队掉队的同志和掩埋的烈士尸体，竟达四百人以上。我们自己，也牺牲了一些同志。

红军过草地期间，不但同大自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较量，而且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者展开了一场尖锐激烈、惊心动魄的斗争。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对他和三军团在过草地前后参予这场斗争的情况，有了较详细的记述。这里，我就个人的所见所闻，再补充一些事情。

张国焘这个人，我是早在1922年在苏联学习时就认识的。那时他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东方会议到莫斯科去的。以后由于不在一起工作，没再见过。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合以后，继续来到两河口。中央正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当我们路过时，张闻天和张国焘都站在会场的门口，向大家招手。张国焘满脸堆笑，洋洋自得。他这副神态当时就给许多同志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随后军委直属队就在两河口召开了一次欢迎张国焘的干部会。我那时还在上干队，同周桓都参加了。周桓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会议由博古主持，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后，就请张国焘给大家讲话。张国焘高谈阔论，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红军的任务。他说，中国革命目前正处于低潮，国民党力量大，红军力量小，我们应当把红旗卷起来，到西康去“保存”这支革命力量，等革命高潮到了，再打出来。往北去，有胡宗南和薛岳、周浑元以

及四川军阀部队围歼我们，凶多吉少。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评以后，这时虽然对自己犯的严重错误还缺乏足够认识，但他在当时红军的行动方针这个问题上，同中央大多数同志是一致的，也主张红军要继续北上。他边听边皱眉头，等张国焘讲完，他又讲了一段，宣传了中央的主张。他说，革命力量是受到了削弱，但是，革命要发展。西康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少，粮食缺，兵员得不到补充，到那里去就钻进了牛角尖，国民党就可来个“瓮中捉鳖”，把我们收拾干净。只有北上才有出路。两个人的讲话针锋相对，一下子把中央争论的分歧点，在广大干部面前公开了。中央领导之间有分歧，应该在中央的会议上去解决，张国焘这样不顾场合、不择手段，在范围这样大的干部会上，把中央的争论公开，其用心无非是想欺骗一部分干部跟着他跑。没想到反闹了个自讨没趣。不等博古讲完，他就连声粗暴地说：散会吧，散会吧！这个欢迎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我调到三军团后，有一次，张国焘见了我，说了一大堆向我讨好的话。他说，你在一方面军一向工作得很好，教条主义者打击你是错误的。你蒙受那么大的冤枉，吃苦头了。这时，我已经比较详细地知道了他和中央的分歧，察觉到这个人有野心。一听他净说这些“同情”我的话，就提高了警惕，只同他说了几句应酬的话，我就离开了。

为了拉三军团站在他一边，张国焘在彭德怀身上更是

费尽了心机。他派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黄超当说客，兜售他那套“欲北伐必先南征”的货色。这件事彭德怀在《自述》中已经写到了。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他还是不死心。有一次，他对彭德怀说，三军团的兵力太单薄了，我从四方面军拨一支部队，给你们补充一下好了！彭德怀当时不置可否，嘿嘿笑了几声。在坚持北上这个问题上，他是旗帜鲜明，毫不动摇的。张国焘发现对手拉不动，最终只是开了张空头支票，没有派一兵一卒来补充三军团。

从两河口会议开始，张国焘一直阳奉阴违，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当中央过草地到这巴西后，他不但不按照毛尔盖会议的决定，带领左路军到巴西会合，反而凶相毕露，打电报命令陈昌浩带领右路军，包括一、三军团全部南下，并准备实行武力解决，公开背弃中央北上的决定。这时，一军团已到达俄界，巴西只有三军团同中央领导机关在一起。在达风云突变的关键时刻，彭德怀和三军团的广大指战员，都是坚定地站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边的。毛主席指示三军团办什么事情，彭德怀总是坚决执行，丝毫不讲价钱。有一天，毛主席要三军团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北上。接电报后，彭德怀毫不迟疑，当即决定派杨勇领导的十团去担负这项任务，并要我和十团一起行动，以便遇到意外情况时及时商量处理。杨勇和十团的同志们机智勇敢，英勇地掩护着中央领导机关走出松潘草地，翻过岷山，直到最后胜利到达陕北。

还有一天，毛主席来电，要三军团派部队去寻找原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廖承志同志。廖承志是1933年加入红军的，随后任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在长征路上，他因对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不满，被张国焘打成反革命，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为了营救他，想尽快把他找到。彭德怀接到电报后，立即要我派部队去寻找。我们派出一个排去寻找了多半天，没有找到。我们感到很遗憾，回电向毛主席如实作了汇报。后来才知道，张国焘把他当作要犯，命令保卫部门把他押走了。直到1936年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合后，恩来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他才被释放出来。

张国焘妄图用武力挟持中央放弃北上的阴谋被挫败以后，陈昌浩等人不择手段地把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部队，都“动员”重过草地南下了。但有少数人员，大约一个排的兵力掉队，被我们三军团收容了。当时彭德怀觉得，这些同志是掉队被我们收容的，可以带他们一起北上。报告毛泽东同志时，毛主席说，一个也不能带，搞得不和睦，将来不好见面。我们要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将来会跟我们一道来的。彭德怀听了，愉快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亲自给这些同志讲了话，宣传了北上的主张。随后就让他们回四方面军去了。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同志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时，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同时也说明彭德怀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是非常坚决的。

三军团随中央领导机关到达俄界以后，会合一军团，随后经过天险腊子口，于九月二十日到达了哈达铺。二十二日，中央在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报告，宣布将这支红军改编成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支队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一军团改称第一纵队。三军团改称第二纵队，纵队长开始由彭德怀兼，不久改由彭雪枫担任，李富春任政委，我仍任参谋长。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则改称第三纵队。

部队过腊子口以后，越走地势越开阔平坦，越走人口越稠密，庄稼越茂盛，越走大家的心情越舒展。部队渡渭河，攀六盘山，从甘南直奔陇东高原。

胜利到陕北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历尽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吴起镇是从甘南进入陕北的第一个市镇，处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一纵队先进了镇子，我们二纵、三纵在吴起镇以西约二十里的地方宿营。吃过晚饭的时候，又接到了进镇的命令，我们即率部队进入吴起镇。

透过苍茫的暮色，我们在镇上看到了久日不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看到了“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不禁心头一热，不少同志都流下了热泪。的确，离开了自己艰苦创业建立的革命之家——中央苏区根据地以后，每

日行军打仗，翻雪山，过草地，不停地走，走，做梦都想有一个落脚生根的目的地，如今终于到“家”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十月的陕北已是深秋，高原气候，早晚已离不开棉衣。而我们的红军大多数都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有的还是从中央苏区出来时的那身灰衣服，如今已褴褛不堪。有的还穿着短裤，有的为了御寒，穿着缴获来的国民党的黄军服，还有的穿着沿途买来的，以及打土豪得来的各色花衣服……加上长途跋涉的劳顿，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个个面黄饥瘦，体力衰弱，不少同志拄着棉干。当时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自己象个叫花子，也真不算过分。特别是三纵队，收容了不少老弱病残的同志，还有女同志、家属、小孩，他们经过这样艰难的历程，吃得苦更多，更是衣衫褴褛，面有菜色。进吴起镇的时候，老百姓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开始还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主力红军，后来听说我们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凭着两条腿，爬雪山，过草地，涉江河，硬是走了二万五千里路时，人人都感叹不已。他们怀着深厚的感情，为红军筹集粮食、布匹，为我们烧饭、缝衣。伤病员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历时一年之久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

到吴起镇的时候，我们的背后还拖着一条“尾巴”——宁夏“二马”（马鸿逵、马步芳）的两个骑兵师还紧紧地尾追着我们。毛主席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我们的根据地，

要坚决“切”掉这个尾巴。到吴起镇的第二天，毛主席召集一、二纵队的领导同志开会，部署了“切尾巴战斗”。他亲自向我们交待了任务，要我们在山川间布置一个口袋阵，让敌人钻进口袋后歼灭之。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梁起伏，大川沟壑纵横，地形很有利于打伏击战。我们在吴起镇以西敌人必经的一条大川中埋伏下，一纵队在正西，我二纵队在左翼。大家憋足了劲，准备狠狠打它一下。但这一仗收获不算大，原因一是敌人发现了我们有埋伏，掉头就跑；二来他们是骑兵，跑起来快的很，不容易追上。结果只消灭了大约一个团的兵力。我们的红军战士虽然经过长途跋涉，体力下降，但革命精神丝毫不减。特别是今天背靠根据地作战，更加斗志昂扬。战后大家觉得还有些遗憾，觉得只敲掉他一个团不够过瘾。这仗以后，这股骑兵再也没有跟踪，“尾巴”切掉了。

回到吴起镇，群众热烈地欢迎我们，镇上到处是送粮送衣的人，很令人感动。在这里，我们休整了几天，象回到家里似的，感到十分温暖。为了尽快解决部队的御寒冬衣，除了群众积粮帮助外，也发动部队自己动手。我记得当时没收了土豪一批羊毛毡布，还发给了我一块棕色的，我自己动手，把它裁成三个筒子，一个做身子，两个做袖子，缝成一件毡衣。长征到陕北时，我还穿着一身夹衣。那时年轻，也苦惯了，不觉得怎么冷。第一次穿上这件相当粗呢面料的衣服，虽然做得不太高明，但很暖和，很解

决问题。脚上又新穿了一双打土豪分的毡鞋，觉得很是不错。彭德怀同志看着我那样子，在一边偷偷笑我。我发现他在偷笑，便问他笑什么，他说我“汉人不象汉人，蛮子不象蛮子”，于是我俩开怀大笑。现在想起来，我那一身打扮也着实可笑的很。

从吴起镇出发，部队向甘泉进发。因为当时红十五军团指挥机关在甘泉下寺湾。在甘泉，我们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成立了西北军委。十五军团与一、三军团合编，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三军团也编入一军团为第四师。这时，我与李富春调到陕甘省委，省委书记开始是朱理治，后由富春同志担任，我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做了一个时期地方部队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部署下，主力红军又进行了直罗镇战役。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歼灭我军。他调兵遣将，在合水、酃县、甘泉、延安构成封锁线，妄图逐渐向北压缩，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西北地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在酃县至合水中段的直罗镇，诱敌深入，集中主力，歼敌一至两个师。十一月二十一日拂晓，红一方面军的一、十五军团分别从南、北两面包围了诱进直罗镇的

敌东北军五十七军一〇九师，经过激战，大获全胜，歼敌一〇九师全部及一〇六师一个团。当时，我刚到陕甘省委军事部，还人地生疏，连一个人都不认识，同志们也不认识我，只知道我是新来的负责干部。看到战斗打得激烈，我即带着陕甘省委军事部仅有的一个警卫连的几十个人，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的追击战。那时地方武装的装备很差，我们冲上去的时候，用的是一些破旧不堪的烂枪，回来时则换了缴获国民党正规军的好枪。指战员们都爱不释手地摆弄着，喜气洋洋。这一仗，正如毛主席所说：“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后，中央所在地移至瓦窑堡。十二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红军主力东征奔赴抗日前线。鉴于红军主力都北上瓦窑堡附近休整准备东征，而南线苏区又扩大，地方武装蓬勃发展，中央决定由我们陕甘省委军事部组建红二十九军，由我兼任军长。我们首先抽调了宜川独立营两个连，中宜独立营和延安、甘泉独立营各一部，成立了四个连，以二十九军的名义在羊泉塬，中宜地区活动。一九三六年三月，在我陕甘省委军事部的主持下，在郿县套通塬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当时只有五、六百人。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是扩大兵源。由于陕北地广人稀，扩红非常困难，我们即在这一带的农村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青壮年参军。建立二十九军，主要是巩固发展根据地

的需要，同时也是争取张国焘尽早北上的需要。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北上，主要是对形势估计右倾悲观，对北上建立根据地丧失信心，要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天全、芦山吃大米。中央到陕北以后，能站住脚，尽快地巩固根据地，扩大武装，奔赴抗日前线，就在实践上驳斥了张国焘的分裂理由，证明中失北上路线是正确的，以此来教育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争取张国焘尽早北上。另外，成立二十九军，从策略上来说，也是为了在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中，有更强大的武装做后盾。

二十九军成立以后，担负了南线根据地的巩固和向东发展的任务。二十九军在店头消灭了夏老么红枪会匪帮，接着深入白区，以黄龙山为中心向东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剿灭土匪，阻止东北军、西北军向苏区进犯，配合主力东征。我们相继在宜川、洛川、韩城、合阳、白水地区开辟了游击区，并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决策，在东北军中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一九三六年六月，北线榆林国民党二十二军一部准备偷袭瓦窑堡我党中失驻地，中央命令二十九军迅速北上，保卫瓦窑堡，保卫党中央。部队赶到时，中失机关已经撤离、迁往保安。奉中央命令，二十九军继续在东线活动，部队与东北军建立了秘密联系，使东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为配合主力西征，红二十九军，开赴西线，一部到定边、盐池，一部到曲子、庆阳、合水一线，配合主力消灭马鸿逵匪兵，吸引胡宗南

部队。同时开辟新的根据地，拔白旗，插红旗，逐步收复了三边、关中、庆环地区的一些县城，在这些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随着根据地的迅速扩大，中央决定将陕甘省改为陕甘宁省，省政府也迁至陇东环县。李富春任省委书记，我仍任省委军事部长，赖传珠任副部长。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电报，说有两个外国客人要到我们这儿来访问，要我们派部队去迎送。这就是斯诺和马海德。由于斯诺是通过宋庆龄介绍、在张学良将军的帮助下，怀着突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探索红军存在、发展的真正奥秘的目的，来到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因而党中央是十分重视的。那时国民党宣传红军是“赤匪”“共产共妻”等等，极尽污蔑之能事。斯诺先生冒着风险，来到边区，采访了大量红军领导人，与毛泽东同志在保安进行了多次长谈，后来写了轰动世界的《西行漫记》，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那次斯诺到我们红二十九军来，就是要从我们这儿继续前往宁夏预旺堡西征红军司令部，去做战地采访的。接到电报后，我们派一个班前去迎接，将他们接到我们的驻地。我看了近年出版的斯诺的《红色中国杂记》和赖传珠同志的日记，证实这一天是八月十二日。那次我是以二十九军军长的名义接待他们的。记得我们请斯诺、马海德吃了一顿饭，还在一起照了相。那时的斯诺还不到三十岁，具有新闻记者特有的热情、机

敏、大胆、率直，喜欢追根溯源，马海德则看上去老成一些。斯诺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陕甘宁边区的形势问题；二是统一战线问题；三是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斯诺问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形势怎么样，如果守不住，是否准备向苏联撤退？我告诉斯诺，我们没有向苏联边境撤退的准备。目前边区的军事形势很好，我们的主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是愿意抗日的军队我们都将和他们联合，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统一战线较之任何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都要大。我向斯诺谈的这些内容，主要宣传了党的瓦窑堡会议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当时由于党正确地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尖锐，国内各阶级的关系都起了变化的事实，确立了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包括非亲日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东征回师以后，进一步提出“停战议和”“逼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在这一策略方针指引下，经过积极的工作，与东北军、西北军签订了秘密的互不侵犯友好抗日的协定。使陕甘宁边区取得了一个巩固发展的良好形势，我们对边区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我对斯诺说，如果没有这个统一战线，你们进入边区就恐怕要遇到更多的麻烦了。关于战略战术问题，我对斯诺说，就反侵略战争来说，战争初期往往表现为阵地战。

在这方面，红军比较弱，因为我们人少，武器差。要取得战争的胜利，目前最有效的战略战术是游击战。我援引了五次反“围剿”时的战例。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一味打阵地战，和敌人拚消耗，结果造成大失败，大转移。就目前来看，红军在游击战的战术运用上取得很大成功。战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如果战略战术运用成功，是完全可以逐渐改变败我力量的对比，以弱胜强的。目前我们就是在争取这样的前途。我们谈得很友好，斯诺对这些看法很感兴趣。当然，他刚到苏区，对红军这一套政治主张和战略战术并不能理解。但对于我们，这都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记得一九三九年，斯诺又一次到过延安。这次比三年前，形势又好的多了，但从生活上来说，还是比较艰苦。那一天中午，斯诺和马海德来到我的窑洞里，正好赶上我在吃午饭，吃的是泡饭和豆腐乳。他们连连摇头叹息，认为红军太苦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天中午是伙房专门为我们几个领导干部改善伙食，吃的与部队不一样，我们自己还感到闹了特殊，很不好意思的。我笑笑对他们说，有豆腐乳吃就蛮不错了。你们这次来，情况不是比上次好多了吗？将来还会更好的。那时的确不觉得苦，因为心里有崇高的革命信仰，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红军的这种坚定的信念给斯诺的感染是很深的。因而他很好地宣传了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好的贡献，这一点，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毛主席、党中央认真分析了形势，高瞻远瞩，作出了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周恩来等同志赴西安谈判。为了策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防止国民党亲日派趁火打劫，主力红军全部调到西安附近。我们红二十九军仍驻守西线，巩固边区。西安事变后不久，我军收复了陕北重镇延安。一九三七年初，党中央搬至延安。从此，延安便成为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

一九三七年二月底，我接到军委电报，调任我为中央军委参谋长，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长的职务由赖传珠接任。临行前，赖传珠还“设宴”为我饯行。在延安的八年，我获得了在毛泽东同志亲切教诲下工作的机会，得到了无比珍贵的教益。

在我就任军委参谋长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正是西路军在甘肃北部倪家营子陷入近十倍于我的敌人重围之中，终日血战不得解脱，临近最后失败的前夕。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和我在红五军团曾朝夕相处的董振堂同志，率领三千余人，就在那里的高台阵地上壮烈牺牲。那时在延安，从中央领导机关到军委的各级机关，工作十分紧张，大家都为挽救这支陷入重围的部队多方想办法。中央已经派了刘伯承、张浩同志组织援西军，火速西行救援。同时，也通过西安事变的谈判，争取蒋介石下令给宁夏“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毛泽东同志为西路军的事情也万分焦

虑。他曾要我起草一份紧急处置的电报，中心是要西路军化整为零，立即突围东进，援西军接应。电报起草好送去，毛主席看后心情沉重地说，先不要发，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有。然而，种种救援办法还未来得及奏效，三月中旬，西路军已最后失败了。消息传来，人人都很沉痛。我们立即通知西线各部队，派出小分队，分散行动，化妆侦察，寻找打散了回未的西路军的同志。一些西路军的干部战士是沿途讨饭回来的，苦得很啊。这样收容了几百人。另一部分由李先念同志率领，经过艰苦转战，翻越祁连山，到了新疆，党中央派陈云等同志去接了回未。西路军的战绩是可歌可泣的，西路军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一九三七年三月底，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会后，在党内和红军中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党中央又召开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进一步动员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即将到来到的抗日战争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我都是身临其境的。北伐战争失败以后，自己怀着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的悲壮心情，出国学习军事。

一九三〇年，当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怀着满腔的热忱，要将自己学到的军事知识，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在闽西苏区，在中央苏区，自己指导过胜利的战争，也遭到过挫折和失败，自己也是在逐步探索能够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战略战术。五次反“围剿”，我从自己参加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对“左”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受到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在那时，自己还不能说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还是从感性认识出发的。终于，革命再次遭到失败，红军不得不转移长征。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力挽狂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军事战略战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痛定思痛，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从血的历史教训中，我逐步认识到，做一个军事指挥员，要不断学习，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将指导战争的一般规律，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这是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

以上就作为自己参加土地革命战争的思想总结。